从寒门书生到近代早期启蒙思想家

—论包世臣思想发展的历程

黄松筠

六十年代初期,学术界对包世臣的思想曾有过讨论。然而,探讨包世臣一生所走过的道路,揭示其思想发展所经历的几次飞跃,这不仅有助于深入地了解他的思想,且有益于认识当时立志救世的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。在鸦片战争前夜,包世臣作为知识界率先走这条道路的代表,他上承顾炎武,下启龚自珍、魏源,实为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先驱人物。

一、走经世致用道路的抉择

乾隆四十年(1775 年),包世臣出生在安徽泾县农村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。他天资聪颖,家教良好,少年时在乡里便颇有名声。由于家境困窘,包世臣年幼失学,靠四处借书阅读。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,他说:"自幼失学,家无藏书,至鲜所见。"①十八岁时,父亲患疥痔病,家中生活难以为继,他便种菜换钱,买药为父治病。从此他一边劳动持家,一边学习古史,正是:"五载侍药隙,夙夜读选史,冥心探原委"②。贫寒的家境与参加生产劳动,使包世臣在青年时代,便初步了解到民间疾苦,也积累了一些农业生产的经验。他曾写道:"唯以食贫居贱,知民间疾苦,则心求所以振起而补救之者"③,可见这一段经历对包世臣后来所走的道路,是不无影响的。

包世臣立志甚早。少年时读《孟子》尚志之说,他便"立志深究天下之利病";十二、三岁时,则"慨然有立于用世,不肯枉己以端其基"。④青年时代,他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,总是榜上无名。他没有把取得功名看成非常重要,而是发愤"力学自振拔"⑤,转向对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,走上了另一条道路。

忧患意识的萌发,是促成包世臣走上这条道路的思想渊源之一。这显然同他早年的身世、家境和经历有关。他在二十五岁时称自已"生长孤露,早涉忧患。"这种忧患意识,随着他阅历的增多而加深,并产生了质的飞跃:由初期对家庭和个人处境的困惑,到后来为国家和民众的前途命运而忧虑。正是这种忧患意识,激励着包世臣在前进的道路上奋力向前,探索社会弊端的根源,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。

包世臣的青少年时代,正值乾隆朝的后期,社会已出现严重的危机,暴动时有发生。在危机四伏的年代,包世臣目睹政治上的腐败和民众的苦难,他不愿走不问世事、皓首穷经的道路。然而,出路何在?青年时代包世臣在思想上的困惑,是可想而知的。

阅读《日知录》首册,拨亮了包世臣前进道路上的明灯。十八岁那年,他看到新刊刻出版的

《日知录》首册，使他顿开茅塞。顾炎武的“经世致用”思想，使他走出彷徨的窘境。他那时是那样地振奋，遂“罢帖括之业”，决心“求吾儒所当有事者”⑥。联系包世臣的贫寒出身、早年立志、务农持家以及忧患意识的产生，可知他所做出的走经世致用道路的抉择绝非是一时的冲动。他在此后的一生中，虽流离困苦，却不改变其救国救民的志向。时人钱献之称赞他说：“今包君身困至是，率口必及民间疾苦，绝无怨尤不豫之色，是其所负者大而且远，贤于古人必矣。”⑦正是救国救民的理想和走“经世致用”道路的抉择，使得包世臣此后在思想上经历了三次重大的飞跃。

二、从禁暴除乱到劝本厚生

包世臣作为生长于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，他所理想的社会是国家政治清明，人民安居乐业。所以，当他目睹清王朝的黑暗腐败，忧患的是这种局面将导致人民起来造反，即所谓“殆将有变”。为此，他认为自己的使命便是为“禁暴除乱”尽力，学习兵家。包世臣回顾他这段经历时曾写道：“世臣生乾隆中，比及成童，见百为废驰，贿赂公行，吏治污而民气郁，殆将有变，思所以禁暴除乱，于是学兵家。”⑧

嘉庆初年，爆发了遍及大半个中国的白莲教农民起义，清王朝调动大批军队残酷镇压。在这个问题上，身受封建主义教育的包世臣是站在清政府一边的。当白莲教起义如火如荼地遍及长江中游地区时，他曾多次给镇压起义的清军统领出谋画策：嘉庆二年，二十三岁的包世臣为安徽巡抚朱珪作《安江贼对》、《练乡兵对》。次年，他又为湖北布政使祖之望作《筹楚边对》，论述如何制止起义、筹边等问题。在对待白莲教农民起义上，包世臣是站在清王朝反动势力一边，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。

然而，包世臣毕竟不是残酷地屠杀农民起义的刽子手。与对农民起义怀有刻骨仇恨的清廷官吏和土豪劣绅不同，他并不主张一味地屠杀起义民众，而主张采取“剿抚兼施”的政策。后来，随着实践活动的增加与个人认识的提高，包世臣对自己这段活动开始有所检讨。他说：“仆少小有所戒，而究斯术（指“学兵家”）。未几，而兵事连起，前后与当路陈说机宜，条别得失，……近则阅事稍多，闻警而惧非复壮豪举矣！”⑨当他认识到人民起来造反的原因是由于无法生存时，从二十六岁始由“学兵家”转向“学农家”。这是因为他“又见民生日蹙，一被水旱，则道相望，思所以劝本厚生，于是学农家”⑩。从提出“禁暴除乱”到主张“劝本厚生”，是包世臣在走经世致用道路时在思想上的第一次重大转变。

“劝本厚生”的提出，在于包世臣对白莲教起义原因的探讨。他针对当时“近者农民之苦剧矣，多虐使以致之”，劝谏统治阶级要“劝农务本”，发展农业生产，减轻农民负担，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。为此，包世臣开始对农政进行研究。二十七岁那年，他写成了《郡县农政》一书。他在阐述写作此书的目的时说：“窃谓治平之枢在郡县，而郡县之治首农桑”⑪。在指出治国的首要任务在于农政的同时，还“裒集农说，断以今宜”⑫，详细介绍各种农作物的种植与栽培技术，是一部全面而系统论述农学的专著。

在写作《郡县农政》的同一年，包世臣为太平府同知姚生子论说“入长出治之事”和“救弊之要”，作《说储》上下二篇，进一步阐述“农为本”的思想，指出“天下之富在农”、“无农则无食”，主张“修法以劝农，使国富而主德尊”，认为农业是国家富强的根本，要“以农为本”，“以民为本”⑬，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。包世臣认为“仓府空虚，非天下之公患

也，患民急而已"，指出"民急"是天下的公患，应通过"劝本厚生"来解决。从禁暴除乱到劝本厚生，是包世臣在思想上的第一次飞跃。

三、从抨击时弊到倡言改革

包世臣所提出的劝本厚生主张，并不被封建统治者所采纳。进入中年后，他抱定"人生但期有益于世"⑭的宗旨，从抨击时弊到进而利用幕僚的身分，在治河、漕运与盐务等问题上，提出了一系列兴利除弊的改革措施，希图为"安邦救民"做些实事。从抨击时弊到倡言并参与革除时弊，是包世臣在步入中年后思想上的又一重大转变。在为治河、漕运和盐务改革而奔走四方的岁月中，包世臣度过了他三十岁到六十岁的宝贵年华。

随着阅历的增长，包世臣对社会的积弊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与认识。他把对时政的抨击，集中在对吏治腐败的揭露。他说："吏收钱漕，既已恣欲浮取，又役任意亏空，……然内而六曹外而郡县，居其官而不能举其所当有事者，盖比比而已"⑮，指出吏治腐败是导致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："吏治污而士习坏，士习坏则民俗漓"⑯，"吏职废而世道衰，……民见良之被害，而奸之有宠，风尚所趋可知也。"⑰包世臣的上述见解是深刻的。他在《答魏默深书》中揭露湖北司捕教匪的官吏"择肥而噬，民不堪命，遂以蜂起变。"⑱在《平闽纪书后》又说："若有司拊循无术，则民不安生，势必流为匪类，乱将滋莫。"尖锐地指出暴政是导致人民起义暴动的根源。

诚然，包世臣对时弊的抨击，并不是从根本上批判封建制度。他不可能从封建制度本身去探讨吏治腐败、风气败坏和民生凋敝的根源。他期望从"整厉风俗"、"正人心"来挽救社会危机，认为"民生之所以日蹙，国用之所以不支者，凡皆廉耻道消、见利忘义之所致也"⑲，以为吏治的败坏是由于"廉耻不明"⑳，用儒家的思想作为批判的武器。

包世臣对时政的抨击，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。包世臣的可贵之处，在于他并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君子，而是把自己一生的大部分心血和精力，都投入到与国计民生攸攸相关的治河、漕运和盐务的改革之中。在实地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，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与措施，于 1825 年著成《中衢一勺》，对消除漕运、治河与盐务的积弊起了一定的作用，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。

在漕运问题上，南粮北运，路遥而运费高昂。加之征集和运输中官吏的层层敲诈勒索，运送一石粮食要花去相当几石粮食的费用。沉重的负担，最终都落到人民的身上，人民不堪其苦。早在 1802 年，包世臣避暑于浮玉山，"见北洋沙船数千艘，停泊黄浦，因发海运可解漕弊之议"㉑。他提出"海运南漕"，主张雇用商船由海道北运江浙地区的漕粮，以节省运费，减轻人民的负担，保证京城的粮食供应。包世臣详细地论述了雇用商人海运漕粮的十大优越性，表明他已认识到商人在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，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很可贵的。

在提出"海运南漕"的同时，包世臣又提出"置屯田"以救漕弊的建议。他建议在北方畿辅地区，选择有水源的地方开置屯田，收获的谷物可较北运的漕粮绰绰有余。这既可以减轻江浙的赋税，又可以使"民气得苏，官困亦解，……上裕国而下足民。"㉒这一建议如能实行，对发展北方农业生产，减轻农民负担，缓和清政府与东南各省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，无疑将起到很大的作用。

治河是与漕运紧密相关的又一件大事。河道经常堵塞已成为当时阻碍漕运的弊端。包世臣说："河，治水事也。水有利有害，能去水害者，在能收水利。"㉓主张把治河与水利建设联系

起来，进行综合治理，反对采取消极的“防河”措施。他对治理黄河与运河所提出的许多合理建议，虽未被统治者所采纳，却为后代治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，具有一定的价值。

致力于盐政的改革，是包世臣这一时期的又一主要实践活动。盐课在清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中，仅次于田赋。当时盐政管理上的纲盐制度，由国家控制和垄断盐的产销，弊病甚多，以至于私枭充斥于市。这不仅严重影响政府的盐课收入，也给灶户和民众生活带来深重灾难。包世臣反对保守派的“缉私枭为治盐之要”㉔的观点，主张废除纲盐制度，取消官府的垄断，采用由盐商自由运销的票盐制度，以收到“民间盐价必减于十之五六，……课入必数倍于今”的“公私皆得，众美毕具”(同上)的良好效果。包世臣对盐政的改革主张，体现了他利用商人活动来代替封建官府垄断、充分发挥商业资本作用的积极思想。

在币制问题上，包世臣针对乾嘉以来因鸦片量输入、白银外流而出现的“银贵钱贱”的严重问题，提出了废除银币而以“钱”、“钞”为币的主张。他说：“专以钱为币，一切公事，皆以钱起数，而以钞为总统之用，辅钱之不及”㉕。包世臣改革币制的主张，其目的是挽救因“银贵钱贱”所带来的财政危机，减轻人民因此所受到的损害。然而，他的主张违背了货币的规律，实际上是行不通的，不可能收到预期的效果。

包世臣从提出劝本厚生、抨击时弊到对漕运、治河和盐政提出一系列的改革倡议和措施，其中不乏有许多可贵的思想。但是，在清王朝的腐败制度下，他的许多合理建议并不会被统治者采纳并付诸实行。而包世臣提出上述一系列改革主张的目的，亦不外是挽救清政府的政治和财政危机，救民于水火之中。如果包世臣只是到此止步，他依然超不出封建时代开明士大夫的范畴。然而，当中华民族因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而出现民族危机时，包世臣沿着经世致用、救国救民的道路继续前进，他的思想便产生了一次更大的飞跃，使他成为中国近代早期启蒙思想家。这时，再回过头来看包世臣一生思想发展的历程，他晚年在思想上的升华，是他中年时代劝本厚生、抨击时弊、倡言改革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。

四、从禁烟到依靠义民御夷

早在嘉庆末年，包世臣就尖锐地指出鸦片输入增加所带来的严重危害。他说：“每年国家正供并盐关备课不过四千余万。而鸦片一项散银于外夷者且倍差于正赋。……近来银价日高，市银日少，实厥漏卮实由于此。”㉖道光八年，包世臣在《致广东按察姚中丞书》中，陈述鸦片输入所带来的危害，提出应及早采取措施。他说：自乾隆四十年(公元 1775 年)鸦片开始输入以来，十数年后，“省垣及惠、潮、漳、泉居人，渐染其毒。嘉庆季年，吴越人亦吸食。比及其末，烟毒遂遍天下。”㉗

清政府曾多次下达禁烟旨令，但鸦片的输入却禁而不止，愈禁愈烈。包世臣指出，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，在于“司禁之人，无不早中其毒，又复得受肥规，即再加严法，终成具文”㉘，“又闻闽中水师，皆食土规，一旦有事，必外向”㉙，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封建官僚相互勾结、共享鸦片输入之利的丑恶面目。同时，他又指出英人勾结匪民，深入内地销售鸦片，是鸦片得以大量输入的又一原因。他说：“夷船通市，止粤海一关。而厦门、兰台、宁波、乍浦、上海各关，皆有闽广乌船抵关转输洋货。新埔客民在其中以分散烟土于各省，而交结其匪民。是英夷虽未至江浙，其党羽实已钩盘牢固。……漏卮之塞，必在厉禁烟土。烟禁真行，……此势必怂恿英夷，出头恫喝。”(同上)

包世臣对禁烟失利原因的深刻分析表明，在禁烟派人物中，是认识较早、见解颇为深刻的人物之一。特别是他曾及时地预见到认真禁烟，必将导致英夷出面武力干涉。他说："英夷造作鸦片以害中华，每岁取中华银不下四五千万，而该夷主收其租岁亦千二三百万。……今鸦片禁绝，则该夷岁入什去五六，……此英夷之不得不以全力争此局者。"㉚为此，他在给广东按察使的信中指出，要及早采取防御措施，"或宥各客民之前愆，悉徙内地，仍前封禁或驱逐英夷，而设重镇郡县。"㉛否则，"十数年之后，虽求如目前之苟安而不能，必至以忧患贻君父。夫岂君子所忍出哉？"（同上）然而，当时清政府中妥协派、保守派掌握大权，包世臣的建议不被采纳，被"笑为迂法，置之不议"㉜。结果，形势发展果不出包世臣所料。虎门销烟之后，英国侵略者悍然发动了对华的侵略战争。

包世臣清醒地认识到，英人的长技在于船只坚固、火器精巧，二者俱非中华所及。因此，在抵抗英国侵略的对策上，他主张采取积极主动的防御措施：第一，在各海口皆设重兵，统筹全局。第二，控制各海关，断绝英人与汉奸通信往来的渠道，防止内外勾结。第三，利用英国与其它各国矛盾，联络其它小国，"集众弱以为强，其翦英夷于海中"，准予其各国通商，并给予优惠。然而，包世臣的上述建议也不被统治者所采纳；唯林则徐南下禁烟路过江西时，曾先后向包世臣询问禁烟事宜，可使包世臣聊以自慰。

鸦片战争爆发后，清军屡战屡败。包世臣指出：英国侵略者所以能长驱直入，是因为清政府中的妥协派采取投降主义路线，不采纳禁烟派坚决抵抗的主张。他说："及道光十八年，黄侍郎设厉禁，虽为时已迟，尚非必不可行也。"㉝然而，当时清政府中的官员，大多见利忘义，"以勾摄烟犯为利薮，欲壑无厌，众怒难犯，引寇召祸"，见敌军则闻风而逃。例如，"厦门之役，……江浙洋面俱有游艇，虽各省劲旅齐集麾下，然军政久驰，遇乱辄奔。"㉞又如 1842 年，"英夷尚未抵达白门，而南京城中的文武官眷早空，绅富纷纷逃窜。"㉟

包世臣在分析战争失利的原因时写道："居今日而言，筹海必以抵循闾阎、苏民困、固民心为先务。……近世司牧民者，类以民畏之，得民财为善政，以善政御危民，官民相仇久矣，委而去之。诵说民间疾苦，使贫者有以为生，富者得以自全，共发其亲上死长固有之良，是与推求炮火之利钝，舟楫之攻苦，攻效必相万也。"（同上）包世臣的这一认识是颇为深刻的。他已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是战争失利的主要原因，指出要战胜英军，必须清除腐败，实行善政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，包世臣已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战胜侵略者的可靠力量。特别是三元里人民的自发抗英斗争，给他以极大的鼓舞。他在《答果勇候书》中写道："三原里义民示谕二通，愤发如云，义形于色，虽当事苦为逆酋乞命，不无扼腕，然逆夷之掘场淫掠，义民立歼其贵人巅地、伯貊，变恶已成。鼓其气而用之，犹当有济。"㊱包世臣向前往广州负责抵抗英国侵略者的督办林则徐、杨威等人建议，组织人民的力量，"使充水师，以渠帅为其讯弁，义民必皆乐从"（同上），以抵抗外国侵略者。包世臣又说："近日之兵难言矣。望乱辄奔溃，而抢掠齐民，使齐民亲贼而仇兵"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主张把义民作为抵御外寇的依靠力量。

包世臣同其他主战派林则徐、黄爵滋、邓廷桢等人的遭遇一样，他的禁烟主张并不被清政府所采纳。但是，爱国之心，拳拳不已。在南京条约签定的前夕，他还作《歼夷议》一首，主张乘敌人初入南京赴宴，击其不备，歼灭敌人，表达了他抵抗英国侵略者的勇气与决心。从力主禁烟到依靠人民御夷，是包世臣在晚年人生路程中所写下的光辉一页。

五、开创一代优良学风之先

包世臣不仅长期充任封疆大吏的幕僚，又是当时在学术界颇享盛名的学者，一生著述甚丰。十八岁时，立志学兵家，好谈论“古兵事得失”，著有《两渊》，为其处女作。二十七岁时，写成《说储》一书，针对当时积弊，提出一系列改革主张；同年又写成《郡县农政》，系一部比较全面论述农业科学的专著。步入中年后，开始研究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农、礼、兵、刑之学，广结天下豪杰，与沈小宛等“诸先生及当代名公相砥砺，闻见益广”㊲，著成《齐民四术》一书。道光五年，《中衢一勺》刻成。该书收集有关“河、漕、盐”三事的论证，在治河、漕运、盐政等问题上提出一系列颇有见地的主张和建议，成为研究上述问题的专家。包世臣又是一位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，所著《艺舟双楫》收集了他在这方面的许多作品。而《管情三义》，则汇集了他一生所作的大部分诗、赋、词。总之，包世臣一生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，在当时学术界有很高的声望。

在治学态度上，包世臣少年时就立志“济世”，读书好谈论得失，以古证今。青年时代起，他选择走“经世致用”道路，把治学同研究社会问题结合起来。他广泛接触社会，注重调查研究，治学态度严谨、务实，反对“浮垮、空谈”的学风，在治河、漕运、盐政特别是在禁烟与依靠义民御敌等问题上，提出了自已的独到见解。他治学的宗旨是“学以致用”、“经世致国”。这在考据学及宋明理学盛行的时代，可谓开一代优良学风之先。

包世臣作为开一代优良学风的先进人物之一，值得提出的有如下两点：

一是对当时学风的不满与抨击。嘉、道时期，风靡一时的考据之学已呈衰落之势，但宋明理学却随之重新抬头。所谓考据之学与宋明理学，两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即：反对学以致用。

包世臣面对知识界的学风不正，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与愤慨。他抨击当时考据之学的弊端：“近世士人争为经学、小学、金石学，大抵疏剔字句小节，不能旁通其大义，又皆矜己屈人莫适于用。”㊳指出这些专治经学的知识分子是“大略以说经名高，眩鼓聋聩，而巧为取利”㊴，把从事考据之学作为自已获取功利的手段。包世臣描绘当时的知识分子群，说道：“士不兴学，鄙弃田事，高者谈性命，卑者矜词章，鄙乎通籍，兼并农民”㊵。

包世臣还对桐城派的文风提出了批判。他反对桐城派文人讲究古文义法，以文学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和纲常礼教，提倡“文以纪实”的文风。他说：“近世治古文者，一若非言道，则无以自尊其文。……夫事无大小，固不必悉本忠孝、攸关国家也。”㊶

包世臣当时既不加入考据学者的行列，也不与理学的宣扬者唱和。他称自已是“宋学既非性所好，汉学又不能自力”㊷，在学术界独树一帜，走经世致用的道路。包世臣对考据之学和宋明理学弊端的批判，在当时学术界影响很大，为新学风的形成，起到了开辟道路的作用。

二是对顾炎武“经世致用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。包世臣十八岁时读《日知录》首册，做出了走“经世致用”道路的抉择。十年之后，他才有条件尽读《日知录》三十卷。对于顾炎武其人其书，包世臣赞叹不已，评价甚高。他说：“叹为经国硕猷，足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风俗，而大为之防”㊸。又说：“百余年来，言学者必首推亭林，亭林书必首推《日知录》”，并说：“予之所以信亭林者，乃即亭林之所以自信”，以自已是顾炎武的忠实信徒而自居，把“经世致用”奉为自已的治学的宗旨。

包世臣在继承顾炎武的“经世致用”思想的同时，对顾炎武学术思想中注重考据的一面则颇有微辞。他指出《日知录》“唯摘章句及畸零证据，犹未免经生射策之习。”又说：“唯《日知录》

闳深简切，足副其守先待后之志，而间出么小考证，仍不免帖括末技。"㊹可见，包世臣所推崇的是顾炎武学术思想中的主要部分即经世致用，而不是考据之学的"末技"。他这种信奉老师又不迷信先哲的追求真理的精神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

包世臣在学术上的成就和优良学风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他上承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，下启魏源、龚自珍，在经世致用上身体力行，成为鸦片战争前夕学术界开一代优良学风的代表人物。

包世臣一生的实践活动表明，是走经世致用道路的抉择，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，使他在思想上经历了三次重大的飞跃。特别是他的从力主禁烟到依靠义民御夷和开创一代优良学风，使他终于从一介寒门书生成长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先驱者之一。

---

①《安吴四种》卷十，《复李迈堂书》。
②《安吴四种》卷九，《述学一首示十九弟季怀》。
③⑥《安吴四种》卷八，《读亭林遗书》。
④⑭《安吴四种》卷四，《与秦学士书》。
⑤《书安吴四种后》。
⑦㊵《安吴四种》卷十五，《钱献之传》。
⑧⑩《安吴四种》卷八，《再与杨季子书》。
⑨《安吴四种》卷二十五上，《齐民四术、目录叙》。
⑪⑫《安吴四种》卷二十五上，《农政》。
⑬《说储》上篇序。
⑮⑯⑳《安吴四种》卷二十八上，《庚辰杂者一》。
⑰《安吴四种》卷三十三，《永康州知县方君寿序》。
⑱《安吴四种》卷三十四。
⑲《安吴四种》卷二十 \下，《却寄戴大司寇书》。
㉑㉓㊴《安吴四种》卷首，《总目叙》。
㉒《安吴四种》卷七上，《畿辅开屯以救漕弊议》。
㉔《安吴四种》卷三，《庚辰杂著五》。
㉕《安吴四种》卷二十六，《再答王亮吉书》。
㉖《安吴四种》卷二十六，《庚辰杂著二》。
㉗㉙㉛《安吴四种》卷三十四，《致广东按察姚中丞书》。
㉘《安吴四种》卷二十六。
㉚《安吴四种》卷三十五，《与果勇候笔谈》。
㉜㉞《安吴四种》卷三十五，《上两江督部裕大臣书》。
㉝㊱《安吴四种》卷四十五，《职思图记为陈军门作》。
㉟《安吴四种》卷三十五，《致徐侍御书》。
㊲《安吴四种》卷三十五，《答果勇侯书》。
㊳《安吴四种》卷三十五，《答傅蜀门书》。
㊶《安吴四种》卷十五，《甘泉训导郑先生碑阴述》。
㊷《安吴四种》卷二十五上。
㊸《安吴四种．与杨季子论文书》。
㊹《安吴四种》卷九，《族兄纪三先生郑本大学中庸说序》。